

超越零和博弈：重思“全民利益”的政治价值

陈童

1 全民利益存在吗？

英美主流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预设在于，它将社会视为一个由无数原子化个体和群体构成的竞技场。在这个场域中，不同人的利益被先验地认定为是异质且相互冲突的。因此，不存在一个超越各种特殊诉求的“全民利益”（the common good 或national interest），有的只是“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s）的角逐。在这种逻辑下，政治本质上成为一种零和游戏：一方利益的满足，必然以另一方或多方利益的减损为代价。于是，政治设计的核心任务，便被简化为建立一套看似公平的规则，让这些特殊利益在此框架内进行博弈、谈判与妥协。

然而，这一基石性的假设是值得深刻质疑的。它窄化甚至扭曲了政治的本意与可能性。全民利益不仅存在，而且应是政治共同体追求的崇高目标。

首先，从发展的、动态的视角看，全民利益清晰可见。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升、科技进步带来的普遍福祉增进、国家安全与主权的巩固、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这些目标的实现，意味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和全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在此过程中，尽管个人获益程度会有差异，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境遇都能得到切实的改善。这是一种“把蛋糕做大”的共赢逻辑。将“国家发展”定义为最根本的全民利益，并不为过。它超越了分配环节暂时的差异性，着眼于全体成员长远的、根本的福祉。

其次，即便在静态的“分蛋糕”即分配领域，追求更公平、更合理的分配方案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全民利益。的确，如同几何学中不存在完美且无宽度的“直线”一样，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绝对的、让所有人均无异议的公平。但正如我们不会因“直线”的物理不可及而放弃在数学和工程中将其作为指引标准和理想参照，在政治和社会治理中，我们也不应因绝对公平的难以企及，就放弃将“更公平的分配”作为核心目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凝聚社会共识、保障长治久安的基石。一个极度不公

的社会，即便经济总量庞大，也必然充满矛盾与动荡，最终会损害包括优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因此，建立并维护一个趋向公平的分配制度，防止贫富悬殊和阶级固化，这本身就是一项关乎所有人利益的全民事业。

英美政治模式之所以在实践中常常陷入困境，其根源或许正在于对“全民利益”这一概念的放逐。当政治话语和制度设计彻底被“特殊利益”的博弈所主导时，政治过程便极易被那些拥有强大资源（如资本、媒体、游说能力）的特定集团所捕获和操纵。政策制定不再是寻求最大公约数、服务于国家整体和人民长远福祉的过程，而退化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分赃和寻租的舞台。长此以往，不仅公共利益被侵蚀，社会共识也难以维系，最终导致国家的内在撕裂与政治失灵。普通民众在无休止的党派斗争和利益集团的操控下，对政治的疏离感和幻灭感与日俱增，这正是“唯特殊利益论”结出的苦果。

综上所述，否定全民利益的存在，无异于在政治哲学的起跑线上宣告了公共精神的死亡。一个健康的政治共同体，不能仅仅满足于充当利益博弈的裁判。它必须有能力识别并倡导那些能够团结全体成员的共同目标——无论是通过发展做大共同财富，还是通过不懈追求建立更公平的分配秩序。重新肯定“全民利益”的价值，并非要否定个体与群体间存在的合理差异与竞争，而是要为这种竞争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与边界：即所有竞争最终应服务于，或至少不损害共同体整体的、长远的繁荣与和谐。这或许是超越当前政治困境的一种深刻智慧。

2 从零和到负和：被制度费用耗散的国家红利

在批判了“唯有特殊利益，不见全民利益”的政治假设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审视其运作的必然结果——利益博弈过程本身。即便我们暂时接受其“零和博弈”的假设，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博弈也几乎不可能是纯粹的“零和”。由于真实世界充满了摩擦力，任何激烈的利益对抗都会产生巨大的内部耗散，这使得零和博弈在现实中往往退化为“负和博弈”。这种耗散，便是新制度经济学深刻揭示的“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

所谓零和博弈，好比两人分一块固定大小的饼，一人多得，另一人必然少得，总和不变。然而，在真实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分饼的过程本身需要消耗资源：利益各方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游说、宣传、公关乃至政治献金；庞大的法律和游说行业应运而生，消耗着顶尖的智力与社会资源；为

了在博弈中占据优势，各方会采取策略性行为，甚至不惜阻碍有效政策的出台或执行，导致社会错失发展机遇；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党派攻讦、议会缠斗、媒体煽动所耗费的社会注意力资源和行政效率损失。所有这些为博弈而付出的成本，都如同摩擦生热一般，从那块待分的“社会总财富之饼”上不断剥屑掉渣，使其整体缩小。

因此，一场看似一方赢50、一方输50的零和博弈，其净结果很可能是一方看似赢了40，另一方输了60，而整个社会却无声地损失了20点的“制度费用”。这损失的20点，本可以用于投资教育、改善基建、推动科研或减轻税负，从而增进全民福利，如今却白白消耗在无休止的内耗之中。当一个政治体系将“特殊利益博弈”制度化、常态化乃至神圣化时，这种制度费用的耗散规模将变得极其庞大，成为拖累国家发展的沉重枷锁。社会不是静止的，在它忙于内斗的同时，外部世界在飞速发展，内部问题在不断累积，机会窗口在悄然关闭。这种内耗导致的发展滞后，是全体国民共同承担的、隐形的但却无比真实的巨大损失。

这正是对“全民利益”否定的第二重悲剧。第一重悲剧在于，它从理念上放弃了共同繁荣的崇高目标，使政治沦为分赃的艺术。而更深层的第二重悲剧在于，即便在其自设的“分赃”逻辑下，由于无视了制度费用的存在，整个分赃过程也变得效率低下且破坏性极大。它不仅在分配成果上难以达致公平，更在过程中持续损耗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潜力。最终，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程度不同的输家。

由此可见，一个卓越的政治体制，其智慧不仅在于能够识别和弘扬“把蛋糕做大”的全民利益，也在于能够设计出“制度费用”最低化的决策与分配机制。它的目标应是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内部的摩擦系数，促进共识的形成，引导能量指向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而非破坏性的分配斗争。将政治简化为特殊利益的角斗场，无异于鼓励一种“高熵”的、充满内耗的社会状态。而追求全民利益，则意味着走向“低熵”的整合与秩序，将分散的力凝聚成推动文明前进的合力。在人类发展的漫长竞赛中，最终胜出的，必然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内部耗散、将全民利益置于中心地位的共同体。

3 以五年规划为桥：长期主义如何塑造全民利益的现实路径

在揭示了“全民利益”的真实性并剖析了“特殊利益”零和博弈的负和本质后，一个核心问题随之浮现：如何将弥散的、潜在的全民利益，转化为具体的、可实现的国民福祉？答案是长期主义。唯有超越短期选举周期和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战略耐心持续推进，全民利益才能从理念走向现实。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下简称“五年规划”）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范本，它生动诠释了长期主义在追求全民利益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1、长期主义：对抗短期噪音与制度耗散的必然选择

短期主义的政治逻辑与特殊利益博弈天然契合。为了迎合选举周期或特定集团的诉求，政策容易倾向于“寅吃卯粮”，用未来的代价换取当下的支持，或者推出那些“立竿见影”却后患无穷的方案。这种模式正是前文所述“制度费用”高昂的主要原因之一——政策反复摇摆，国家发展方向因政府更迭而迷失，大量社会资源耗费在方向性的争论与调整中。

长期主义则是对此的根本性修正。它要求一个政治体系必须具备战略定力，能够穿越经济周期和短期政治波动，始终锚定那些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全民根本利益的目标。这种定力，极大地降低了因政策反复、方向不明而产生的巨大“交易费用”，使得国家能量能够持续、稳定地投向具有长期回报的领域。

2、五年规划：长期主义的制度化与实践蓝图

中国的五年规划并非简单的经济指标设定，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长期治理机制。其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共识凝聚与目标锚定：每个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共识凝聚过程。通过广泛的调研、论证和协商，它将“全民利益”这一相对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未来五到十五年国家发展的具体优先事项，如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如今的“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过程，让全民利益有了清晰的时代内涵和奋斗方向，超越了不同地区、行业短期诉求的纷争。

提供稳定预期与协同框架：五年规划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国有企业到私营部门、从科研机构到社会各界提供了稳定且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所有行为主体都清楚地知道国家在未来一个时期的主要发力点是什么，基础设施将向何处倾斜，产业政策将支持哪些方向。这极大地减少了

市场主体因政策不确定性而产生的观望和投机行为，引导全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朝着规划设定的目标前进。这种巨大的协同效应，显著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成本。

迭代优化与动态调整：长期主义并非僵化不变。五年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智慧在于其“滚动发展”的特性。每个五年规划既是对上一个规划的承接与深化，也是根据国内外新形势进行的调整与升级。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的迭代模式，既保证了战略方向的连续性，又赋予了策略执行的灵活性。它使得国家发展能够避免颠覆性的中断，而是在持续的经验积累和路径优化中稳步前进。

3、从愿景到现实：长期主义如何兑现全民利益

通过五年规划这一长期主义工具，那些关乎全民利益但短期内难以见效的宏大工程才得以实现。例如，覆盖全国的高速铁路网、消除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构建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以及持续数十年对基础教育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些项目无一不需要跨越多个政治周期、投入巨量资源且短期经济回报不显著，但它们从根本上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全体人民的生活底线与发展机会，是“全民利益”最坚实的体现。

4 结论

否定全民利益，政治就会陷入特殊利益博弈的负和陷阱，在无尽内耗中虚度光阴。而肯定全民利益之后，能否将其付诸实践，则取决于是否拥有长期主义的视野与定力。中国的五年规划，正是将长期主义制度化的关键探索。它如同一座桥梁，将“国家发展”这一终极全民利益，分解为一个个可执行、可评估的阶段性目标，并通过国家力量的持续投入和全社会的协同，一步步将其变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长期主义不仅仅是耐心，更是一种将全民利益从政治理想转化为生活现实的根本能力。